

清宮洋畫家王致誠

明曉豔*

王致誠 (Fr. Jean-Denis Attiret) 是法籍耶穌會士，1738 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來華，為乾隆朝宮廷畫家。其藝術成就與郎世寧比肩，但其名字卻鮮為人知。他不僅為皇帝畫了無數的風景、人物畫，而且是《乾隆皇帝得勝圖》大型系列版畫的主要創作者，也是圓明園大水法的主要裝飾繪畫者之一。他逝世葬於北京正福寺。可惜的是，中文文獻中關於他的文獻並不多見，甚至其人的漢名也沒有個定論。本文對王致誠的中文用名、宮廷藝術生活、中西繪畫、建築藝術交流及墓碑遺存等試加考證。

我國宮廷繪畫歷史久遠，特別是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清代宮廷繪畫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1）康熙時期，為初創時期。畫家供奉內廷，繪畫事宜由內務府管理。2）雍正（1723-1735）、乾隆時期，為鼎盛時期。雍正時期，內務府下設畫坊；乾隆時期，在內務府中設有如意館、畫院等機構，並形成完整的宮廷畫家的管理制度。3）嘉慶（1796-1820）時期，為衰落期。乾隆年間十分重視繪畫藝術，宮廷畫家作畫必須先畫出草圖，經皇帝審閱批准後，方能正式落墨。法國畫家王致誠（Fr. Jean-Denis Attiret）就是這一時期清宮廷畫家的重要人物之一，是繼意大利畫家郎世寧（1688-1766）之後的又一名在中國宮廷繪畫史上著名的歐洲畫家。

王致誠與巴德尼

王致誠，法國人，耶穌會修士，乾隆年間宮廷畫師，自1738年到達中國後，數十年服務於宮中，謝世後葬身於中國土地。他的西文名字是 Fr. Jean-Denis Attiret。遺憾的是，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刻有“王致誠”

名字的墓碑，卻發現法國耶穌會修士巴德尼墓碑上的西文名字也是 Fr. Jean-Denis Attiret，並且其生平簡歷與王致誠相似。為進一步研究宮廷畫家王致誠，我們有必要對 Fr. Jean-Denis Attiret 的中文名字作考證。

一、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M. Pelliot）於1921年在法文《通報》第190-192頁論述 Fr. Jean-Denis Attiret 的中文名字說：“從 Fr. Attiret 修士1769年在北京時寫給巴黎教會的一封信中得知，Fr. Attiret 修士的中文名字是‘巴德尼’。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這個名字；在1765年的一本譯著中說 Vanchichim（王致誠）就是 Attiret；在1765年的另一本同時出版的刊物中指出，Fr. Attiret 修士的中文寫法是‘王致誠’。”《通報》第191頁還記述了1869年 Fr. Attiret 修士墓碑損壞的情況：“在殘缺不全的拉丁文墓碑背面，另刻有中文碑文，其 Fr. Attiret 的中文名字為‘王致誠’。”

二、法國耶穌會費賴之神父和薛孔昭、高迪愛神父都曾記述⁽¹⁾說 Fr. Attiret 曾多次用“巴德尼”這一漢名。在 Fr. Attiret 剛來華時，似乎就取了這個名字，並認為，“德尼”顯然是他的洗名 Denis 的音譯，至於“巴”，可能是任意取的。

*明曉豔，女學者，2001年結業於北京大學宗教學系研究生班，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社會教育部主任，館員；編著有《北京歷史上的名人》（主編），《基督教辭典》（修訂版、合編），《中國近百年名碑》（北京部分），《石刻卷·刻石》等；發表論文〈梁啟超家族墓園與石刻〉、〈北京法國耶穌會士墓地與錢德明墓碑〉、〈北京石刻文化展巡禮〉、〈從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耶穌會士碑看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與作用〉、〈錢德明在東學西傳中的作用與貢獻〉等。



《十駿馬圖冊》之一

絹本、設色 中國故宮博物院藏。原載《中國美術全集》，1989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三、據法國耶穌會 Planchet 神父於1918年出版的法文版《正福寺墓地與教堂》一書第26頁記載：1896年正福寺傳教士墓地平面圖中第19號為 J. D. Attiret；第33頁記載，1900年後重修的正福寺傳教士墓地平面圖中第39號為 Denis Attiret，第65頁為 Fr. Jean-Denis Attiret 墓碑錄文，碑陽左側刻有拉丁文等，右側刻有中文“耶穌會士巴先生字德尼”等。

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中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四冊，第3-19頁）中，記錄了乾隆年間皇帝命王致誠進宮繪畫或為皇室、園林繪畫的諭旨數十道，曾用過中文名字“王致誠、王之誠和王志誠”，其西文名均為 Jean-Denis Attiret。

五、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法國耶穌會士巴德尼墓碑，碑陽文字與《正福寺墓地與教堂》一書中第65頁碑文完全相同。

六、對巴德尼與王致誠的個人資料進行比較發現，巴德尼與王致誠同為法國人，均於1738年到達中國，且與意大利畫家郎世甯同在乾隆宮中任畫家。

綜上所述，我認為，Fr. Jean-Denis Attiret 修士可能使用過兩個中文名字，即巴德尼和王致誠。當然，也有人提出，“王致誠”是 Fr. Attiret 修士在中國的官名。Fr. Attiret 服務于清宮，為皇室繪畫“行走”時，所有繪畫，在內務府檔案記載中所用中文名為：王致誠、王之誠或王志成。因此，我認為：王致誠服務於中國清代宮廷三十餘年，在中文名字的使用上，主要是“王致誠”。



《十駿馬圖冊》之二

絹本、設色 中國故宮博物院藏。原載《中國美術全集》，1989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王致誠小傳

王致誠（1702-1768），法國人。乾隆五年（1740），三十八歲，入法國耶穌會，在會二十三年。1738年到達中國澳門，同年進京，為乾隆年間宮廷畫家。1768年死於北京，葬於海淀區彰化村正福寺法國耶穌會墓地。

1702年7月31日王致誠出生於法國多勒市的一個藝術品修復世家。因其全家酷愛美術，使幼小的王致誠在“調色板和畫筆中長大”。“當他還在孩提時期，就在父親辦的學校裡開始學畫了。據他追

述：‘他最大的興趣是在紙上塗抹，以後稍稍有所進步，不致再浪費顏料了。’”⁽²⁾ 他熱衷於“用鉛筆勾畫西班牙風格的古房子以及斷代為夏爾·昆詩（Charles Quint）時代的防禦工事”，“不久就顯示出他在這門藝術上的才華”。⁽³⁾ 後來在普羅瓦西亞（Broissia）侯爵的鼓勵和資助下，王致誠赴羅馬深造。學成後回法國，途經里昂時，他為許多人作畫，包括維勒魯瓦（Villeroy）大主教和市長佩里松（Perrichon）等一代名流，初得名氣。1733年，王致誠回到故鄉，全身心地投入繪畫工作，他的作品〈金牛〉、〈尤滴和奧洛法納〉被用於裝飾法國多勒市政府的大階梯，還有部分作品被多勒市博物館收藏。



準噶爾首領達瓦奇肖像（1755年）
柏林民族藝術博物館藏
原載（法）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

1735年7月31日，王致誠入阿維尼翁修道院，成為法國耶穌會士。當時，在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正向法國耶穌會請求派遣一名優秀的畫師來華，以補清宮畫師之缺，更重要的是，輔助法國耶穌會在中國發展傳教事業。1738年，王致誠自願應召，被法國耶穌會派往中國傳教。

1738年1月9日，王致誠乘船從法國里昂出發，經過十四個月的旅行，於乾隆四年（1739）七月到達中國澳門，後途經廣州進入北京。一到北京，他就把一幅取材於《聖經》故事中的〈三王來朝〉⁽⁴⁾聖像畫奉獻給乾隆皇帝。乾隆帝非常喜愛，命人將這幅畫懸掛於宮中殿堂內。乾隆皇帝非常重視王致誠的繪畫才能，當年降旨命王致誠每日入宮繪畫，從此，王致誠逐成為服務於乾隆皇室的西洋畫家。

王致誠擅長西洋畫法，特別是用油畫描述歷史事件和人物肖像，其它畫法，非其所長。初為皇室

作畫時，他繪製了一些在御花園中嬉戲的仕女圖。乾隆帝一邊欣賞，一邊詢問：“這是中國女子，還是歐洲女子呢？”王致誠回答：“這都是些中國女子。”乾隆帝反駁道：“她們與中國女子毫無相似之處。”“乾隆帝對西洋畫並不欣賞，一是因為他對畫面上的油漆味頗為敏感，一是畫面中的陰影，尤其是深沈的陰影，在他看來不是藝術而是塗鴉。”⁽⁵⁾為迎合皇帝的愛好，也為法國傳教士在宮中有一席之地，有助於法國傳教士事業在中國的開展，王致誠不得不改變畫風，學習中國畫法，從事風景畫、戰爭畫以及花鳥、建築和裝飾繪畫等。他在《耶穌會士書信集》卷三頁793記述：“我們作畫，都得聽從帝旨；畫好初稿之後，先得讓他過目，做些修改；改得正確與否，不得妄加評論，必須照辦。”王致誠由於被迫放棄西洋畫法，而屈從於中國帝王、王公大臣和皇室成員的喜好，心中常常鬱悶。特別是有一天，乾隆帝聖旨送至王致誠處，御書：“水彩畫無疑更受人喜愛，不論從哪個角度去欣賞，都感到賞心悅目。為此，新來的客卿要按照一般宮廷畫師的方法作畫。對人物畫一門，仍可採用油畫。”聖旨的到來，使本來就鬱悶的王致誠感到更加不快。他認為，自己是作為一名西洋畫的藝術家來中國的，而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繪畫學徒者。事後，在宮廷畫家郎世寧修士的勸導、鼓勵下，王致誠雖認為“所作的繪畫既不合我的興趣，也不是我發揮才華的藝術；還得加上種種說不盡的麻煩。若非我的畫筆還能對教會起積極作用，讓皇帝對傳揚福音的神父有所好感的話；若非在我的艱辛勞動後面，看到日後天堂的話；我該早日要求‘歸去來兮’了。這是唯一的吸引力把我吸引在此地，同時把來自歐洲為皇帝服務的那些傳教士們吸引在此地的原因。”⁽⁶⁾從此，王致誠為了耶穌會傳教事業在中國的發展，他把為滿足宮廷繪畫服務視為傳教事業的一部分，努力學習中國繪畫技巧，專心致志地投入繪畫創作之中。

王致誠作畫細膩、精密，講究透視效果。乾隆皇帝常常來看他作畫，並與他親切交談，有時還穿上各式服裝，從不同角度讓他畫像。這使得王致誠有機會將觀察到的乾隆皇帝的各種姿勢和各種服飾



蒙古王公像（之一）（1755年 紙本油畫）
柏林民族藝術博物館藏
原載（法）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



蒙古王公像（之二）（1755年 紙本油畫）
柏林民族藝術博物館藏
原載（法）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

繪畫下來，對於不合帝意之處，乾隆皇帝還親自動筆修改。

乾隆十八年（1753），王致誠曾奉乾隆諭旨，為葡萄牙使臣帕切科（Pacheco）繪肖像畫。

乾隆十九年（1754），清兵為遠征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征討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該地區最終於1757年被平定，取名為“新疆”）獲得大勝，凱旋而歸。七月二十三日（1754年9月9日），承恩公德奉旨：“帶領西洋人王致誠往熱河畫油畫十二幅。欽此。”王致誠奉旨到達熱河後，為晉爵的十二位蒙古族親王、國公和將軍畫像。他在記述中寫道：“這些韃靼人不太習慣看到自己被如此畫像，對於在絹本上辨認出自己感到驚訝，非常高興能與自己相見。（……）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發笑，當我畫了幾筆之後，他們多少都發現了畫像與自己之間的少許相似性。當完全相似時，它們又如同是心醉神迷一般。”數日之後，王致誠又開始為乾隆帝畫

像。這次隨乾隆皇帝巡幸韃靼期間，王致誠共作人物油畫像二十二幅，凱宴儀式繪畫四幅。從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神父著的《王致誠傳》中我們得知：“一旦當大清王師取得了某些勝利時，皇帝便立即下達一道敕令，立即為獲勝者畫像。”王致誠便是宮中“隨軍”的洋畫家之一。

乾隆皇帝對王致誠的繪畫十分滿意，乾隆十九年七月，封王致誠為四品官。王致誠得知後，請一位宮中大臣代為稟告：王致誠是傳教士，不能接受乾隆帝賜予的爵位。第二天，王致誠早在宮中雙膝跪地，等候向乾隆皇帝謝恩。乾隆帝問王致誠：“愛卿竟然不想居官，這是為甚麼呢？”王致誠回答：“陛下深知其因。我是教徒，由於我的身份而無法享受那樣的榮譽，它與我的身份不相膾合。”“但郎世甯修士卻非常坦然地居官了，他也同樣是教徒，（……）劉松齡神父現在供職于欽天監……”最後王致誠對乾隆帝說：“我既不太會講話，也無法

很好地聽懂中國話。”乾隆帝對這回答似乎滿意，從此不再提及此事。

三十年來，王致誠一直作為一名宮廷畫師服務於皇廷，其作品多為皇宮所收藏。乾隆三十二年（1768）十二月八日，王致誠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六歲。消息傳到乾隆帝那裡，“乾隆帝立即下詔，令一位大臣送去二百兩白銀，用作殯葬開銷。”下葬那天，“皇帝派遣其主要太監之一，以皇帝的名義，前往靈前弔唁，並步行陪靈直到墓地。”⁽⁷⁾當時，所有的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多明我會士、方濟各會士等，都身着中國式白色葬禮服，使耶穌會士王致誠的葬禮既莊嚴又隆重，表現了耶穌會士葬禮之中國本土化特色。

現存王致誠的繪畫代表作有：

- 1)《十駿馬圖冊》，中國故宮博物院藏。⁽⁸⁾
- 2)《萬樹園賜宴圖》軸，中國故宮博物院藏。⁽⁹⁾
- 3)《紫光閣凱宴圖》（天花板圖），中國故宮博物院藏。
- 4)《平定回部獻俘圖》，由瑪斯格利雕版，伯德來私藏。
- 5)《河洛霍漸之戰》，巴黎國家圖書館和日本天理大學收藏。
- 6)《準噶爾首領達瓦齊肖像》，畫於1755年前後，德國柏林民族藝術博物館藏。
- 7)《守護天神圖》。

王致誠與《乾隆皇帝得勝圖》（1769-1775）

乾隆四十一年（1775），由王致誠、郎世甯、艾啟蒙（P. Ignaz Sichelbarth）和安德義（P. Jean Damascene）四位耶穌會士宮廷畫師共同完成了《乾隆皇帝得勝圖》組畫十六幅，描繪了乾隆皇帝於乾隆二十年（1755）到二十四年（1759）間，平息邊疆叛亂、解決民族團結、統一疆土等重大事件。

乾隆皇帝在位以來曾經決定或主持過多次軍事行動，在他晚年所寫的《十全記》中，將十次重大軍事行動總結為“十全武功”，自號“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所記載的重要軍事行動概括

為：“十功者，平定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之降，合為十。”⁽¹⁰⁾這“十功”說起來並不順口，卻是乾隆皇帝回顧一生功績的寫照，意在通過軍事成就彰顯自己的仁君之道，“以昭武功而重久遠”。

乾隆繼位時，國家尚沒有統一，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有時也稱“喀什噶爾”）的割據勢力還沒有最終解決，成為清朝政府統一全國的最大難題。康熙三次親征，祇不過把他們打回阿爾泰山以西；雍正年間對準噶爾出兵，傅爾丹和通泊之敗，幾乎全軍覆沒；乾隆年間，先後兩次出兵征伐準噶爾首領達瓦齊，接着又平定了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和天山南麓大小和卓木的叛亂，先後用了近五年的時間，最終解決了康熙皇帝登基以來，八十年沒有解決的國家統一問題，奠定了中國的版圖。

《乾隆皇帝得勝圖》組圖，描繪了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其中，王致誠等人所作《凱宴成功諸將士圖》，描繪了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西北邊疆準噶爾部達瓦齊的叛亂，為慶祝大捷，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萬樹園賜宴⁽¹¹⁾、封爵、賜賞、觀火戲⁽¹²⁾犒賞得勝歸來的將士們及厄魯特四部（準噶爾、都爾伯特、輝特、和碩）的首領，並分封為汗王、貝勒、貝子等爵位。盛大的慶祝活動持續三個月之久。為紀念平定準噶爾的勝利，乾隆帝在承德普寧寺勒碑，以漢、滿、蒙、藏四種文記述戰事的全過程，向世人彰顯歷史的功績。

王致誠所作《和落霍漸之捷圖》記述了在平定準噶爾達瓦奇割據叛亂之後不久，阿睦爾撒納又發動了叛變，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軍第二次出兵準噶爾伊犁地區，並大肆殺戮，在和落霍漸與阿睦爾撒納軍大戰，阿睦爾撒納戰敗後逃往沙俄，病死。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乾隆皇帝又親自撰寫《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並置碑於河北省承德普寧寺。碑文詳細記述了這次戰役的起因、經過以及大清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懷柔政策。同年，乾隆皇帝為和落霍漸之捷御筆題詩云：



河洛霍漸之捷圖 王致誠作於1766年、勒巴雕版。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原載（法）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

今春我師剿逆夷，首戰實和落霍漸。
斬將奪旗早報捷，酬勞頒賚已有差。
即今生解俘囚至，曰渥赭特宰桑伊。
散秩大臣曾授職，乃敢倡亂如鴉鴟。
面詢彼所致敗故，咋舌惟歎天奪其。
彼眾猶有千餘騎，覘知我寡設計奇。
輜重遠行誘我逐，層層伏賊據險巖。
官軍四百始馳至，少騎示弱山之陞。
我進彼乃蠡涌集，銃礮如雨循環施。
我軍曾無一傷者，百靈擁護信有之。
衝鋒突入矢齊發，賊乃喪膽紛離披。
鹿埵隴種各逃命，大鞬大膊張軍威。
殲彼屍僵近四百，負傷遁者數無訾。
是誠天助額手慶，奮勇要亦資人為。
問率軍者其人誰？超勇親王家聲貽。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軍平定了新疆天山南麓回部大、小和卓木⁽¹³⁾之亂，“尸布拉呢敦，而函霍集占首”，“收自古以來未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

臣之民”，統一了新疆，並設伊犁將軍總理軍政事務。為確立中國疆域版圖，建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奠定了基礎。《平定回部獻俘圖》是王致誠這一時期的作品，表現了清軍平定回部大捷之後，將回部叛軍霍集占的首級，懸掛於皇宮午門之上，作為戰俘呈獻給皇帝的場面。⁽¹⁴⁾ 乾隆二十五年御題詩文一首：

函首霍占來月竈，傾心素坦款天閭。
理官淑問寧須試，驃騎窮追實可臧。
西海永清武保定，午門三御典昭詳。
從今更願無斯事，休養吾民共樂康。

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始於伊犁受降，迄於回部獻俘。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1764年11月27日），乾隆皇帝降旨“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十六張，着郎世寧起稿，得時呈覽，陸續交粵海關監督轉交法蘭西雅國，着好手人著稿刻做銅板。其如何做，即着郎世寧寫明一併發去。”⁽¹⁵⁾ 乾隆三十年七月（1765年9月），宮廷洋畫家郎世寧、王致誠、



平定回部獻俘圖 王致誠作，原載（法）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

艾啟蒙、安德義將完稿的《乾隆皇帝得勝圖》十六幅中的前四幅呈乾隆帝御覽，恩准後，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運往法國，進行雕版製作。王致誠所繪〈阿爾楚爾之戰圖〉為《乾隆皇帝得勝圖》中第一批運往法國的四幅繪畫之一，其餘三幅是郎世寧繪的〈格登鄂拉斫營圖〉、艾啟蒙繪的〈平定伊利受降圖〉、安德義繪的〈呼爾滿大捷圖〉。次年7月，其餘十二幅也相繼被運到法國。

這批畫受到了法國國王的重視，法王建築總管馬里尼（Marigny）侯爵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國皇帝對這十六幅版畫的重視，它即將“向羅馬並向全世界揭示對準噶爾汗國及其附近回疆地區的平定”。他委託皇家藝術院首席版畫家柯欽（Cichin）來主持這項工作，並命令他祇能使用技藝最高超的工匠。他們從英國購置了銅板，並自行設計了一種被稱為“大盧瓦”的特殊用紙用於雕版的印刷；同時，選中了法國著名印刷專家博韋（Beauvais）先生負責印刷

工作。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第一批銅版畫七幅，從法國運到北京。從《耶穌會士書簡集》第24卷中我們得知，乾隆皇帝對法國版畫家們的工作非常滿意，於是降旨，用這七幅銅版重新印刷一組版畫，並將版畫陸續頒賞給皇子及文武大臣。三年之後，即乾隆四十年（1775），最後一批得勝圖銅版畫終於從法國運達北京。這時，王致誠已經逝世七年，郎世寧也已逝世九年了。

乾隆皇帝對銅板雕刻十分滿意，再次頒賞得勝圖給王公大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頒賞清單：第一次賞得勝圖十八份，賞給六阿哥、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十七阿哥、綿德阿哥、……于敏中、和坤等；第二次賞得勝圖二十份，賞給禮親王永恩、睿親王淳穎、肅親王永錫……；第三次賞得勝圖三十六份；第四次賞得勝圖十九份；第五次賞得勝圖四份。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諭令將得勝圖分送全國各地行宮及寺院等處陳設並保存。^{（16）}



平定伊犁回部得勝圖 郎世寧、王致誠等繪 中國故宮博物院藏

近日筆者從法國1921年出版的《通報》中看到，當年法國耶穌會士王致誠、郎世寧、艾啟蒙、安德義所繪的《乾隆皇帝得勝圖》十六幅依次是——

乾隆二十年（1755）作：〈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營〉；

乾隆二十三年（1758）作：〈和落霍漸之捷〉、〈庫隴癸之戰〉、〈烏什酋長獻城圖〉；

乾隆二十四年（1759）作：〈黑水圍解〉、〈呼爾滿大捷〉、〈拔達山汗納款圖〉；

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平定回部獻俘〉、〈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凱宴成功諸將士〉；

乾隆三十一年（1766）作：〈通古斯魯克之戰〉、〈霍斯庫魯克之戰〉、〈阿爾楚爾之戰〉、〈伊西洱庫爾卓爾之戰〉。

但是，筆者就其畫稿、事件的年代進行了考證，認為《乾隆皇帝得勝圖》的事件順序應該是：〈平定伊犁受降圖〉、〈格登鄂拉斫營圖〉、〈鄂壘紮拉圖之戰圖〉、〈和落霍漸之捷圖〉、〈庫隴癸之

戰圖〉、〈烏什酋長獻城圖〉、〈黑水圍解圖〉、〈呼爾滿大捷圖〉、〈通古斯魯克之戰圖〉、〈霍斯庫魯克之戰圖〉、〈阿爾楚爾之戰圖〉、〈伊西洱庫爾卓爾之戰圖〉、〈拔達山汗納款圖〉、〈平定回部獻俘圖〉、〈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圖〉、〈凱宴成功諸將士圖〉。^{〔17〕}

十六幅銅版畫均採用全景式構圖，充份地反映了戰爭進行的過程、規模和全貌。雕版製作，精緻細微，不僅是宮廷西洋畫師的集體創作，也是中西繪畫藝術相互融合的重要實踐，具有濃鬱的歐洲繪畫風格。每幅尺寸均為 90.8 x 55.4 釐米。

王致誠與中國宮殿、皇家園林繪畫

作為乾隆皇帝的禦用畫家——耶穌會修士王致誠，始終沒有忘記向法國耶穌會報道他們在中國宮廷的畫家生活和工作情況，對他們感興趣的中國宮廷建築、皇家園林進行詳細的報道。

乾隆十四年(1749)，王致誠寫給法國教會的一封關於中國皇帝郊外御花園的書信，被刊登在法國《耶穌會士書簡集》中，此文用大量筆墨描繪了皇家園林——圓明園，贊揚了圓明園的平面設計和建築施工：“那裡的一切建築既宏偉又美觀。這或是歸功於建築圖，或是歸功於施工。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在我看來，它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相似之處。”宮殿“由相互之間獨立的一批住宅組成，但非常對稱和諧，由寬敞的院子、花園和花壇分隔開來，所有這些住宅的門面都由於塗金、油漆和繪畫而金碧輝煌。室內裝修和佈置有中國、印度及歐洲所擁有最漂亮和最珍貴的東西。”“橋梁都設有漢白玉的欄杆，經過高度藝術加工並雕刻有淺浮雕……”這封書簡不僅在法國引起重視，而且引起歐洲人的極大關注。乾隆十七年(1752)年，被哈里·博蒙(約瑟夫斯賓塞)譯成英文發表，題為“中國皇家園林的特殊意義”。譯文的大部內容先後被《倫敦雜誌》、《月刊雜誌》和《蘇格蘭雜誌》轉載，使更多的歐洲人把目光轉向了中國。

喬治·R·洛埃爾(George R. Loehr)，1976年在《卡塔西雅叢書》第77頁中這樣評價王致誠的書簡：

〔歐洲〕正是在對中國工藝品和中國禮儀的崇拜高潮中出現了王致誠的書簡。因此，在這種對於英國—中國式園林的崇尚之中，則必須與其構圖中畫出一些不規則的甬道、崎嶇蜿蜒的小溪、帶有小島的湖泊、岩石和瀑布等。大家很容易看到這種不規則性和非規則性與羅可可式裝飾非常相符。(18)

由於人們看到了英國園林和中國園林的不對稱性，在法國才出現了“英國—中國風格的園林”的建築稱謂，繼而又誕生“英國—中國園林”一詞。當時，由於王致誠等耶穌會士通過書簡、繪畫等形式對中國宮殿、皇家園林進行的大量報道，在法國、德國、丹麥、芬蘭、瑞典、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掀起了“中國熱”潮，使“英國—中國式園林”建築成為時尚。

在學術界有不少關於中國園林論著問世，如《哥特式、中國式和近代審美觀的裝飾性建築》(1758年，夏爾·奧韋)、《論中國建築》(1759年，保爾·德克)、《中國對歐洲園林結構的影響》(1936年，埃萊阿諾爾·馮·埃德貝克 Eleanor Von Erdberg)、《18世紀歐洲的中國園林》(1951年，喜龍士 Oswald Siren)等，都不同程度地受過王致誠的影響。

王致誠作為宮廷畫家，為乾隆皇室服務達三十餘年，他的繪畫不僅描繪戰事、賜宴、記事等場景，更多的繪畫還用於裝飾皇家園林和殿堂。從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清中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僅在第四冊中就收錄了乾隆皇帝命王致誠為皇家園林、宮殿繪畫的聖旨數十通，在此僅舉數例，可見一斑。

初三日，畫畫人戴正持來押帖一件，內開本日太監毛團傳旨：着西洋人王致誠畫畫柏唐阿、王幼學致松風開畫油畫書格二張。欽此。〔乾隆四年九月初三日、1739年10月5日〕

二十六日，催總廖保持來司庫郎正培押帖一件，內開為本日太監毛團傳旨：西洋人王致誠、畫畫人張維邦等着在啟祥宮行走，各自畫油畫幾張。欽此。〔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1739年10月28日〕

初十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騎都尉巴爾當催總花善押帖一件，內開為正月二十四日，太監胡世傑交長春仙館墨池雲裝修紙樣一張。傳旨：中層明間面闊板牆中間，着王致誠速畫油畫表盤一張。欽此。〔乾隆九年二月初十日、1744年3月23日〕

初五日，副催總王來學持來司庫郎正培、騎都尉巴爾當押帖一件，內開為七月初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着王致誠畫油畫。欽此。〔乾隆十年初五日、1745年8月2日〕

初十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副司庫瑞保押帖一件，內開為五月十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香山情賞為美園光門上，着王致誠畫美人一幅。欽此。〔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十日、1747年6月17日〕

十三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福副司庫瑞保押帖一件，內開為十一月初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將噶爾丹策楞進的馬着郎世甯、王致誠、艾啟蒙各畫馬一匹。欽此。〔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747年12月14日〕

二十六日，司庫白世秀、催總六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着啟祥宮王致誠畫簾刷下畫美人面向右。欽此。〔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748年6月21日〕

初一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瑞保押帖一件，內開為五月二十七日太監胡世傑交寧靜舟門口樣一張。傳旨：着王致誠畫簾刷下畫美人面向右。欽此。〔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初一日、1748年8月24日〕

十五日，副催總佛保持來員外郎正培、庫掌瑞保押帖一件，內開為五月十二日太監王自雲來說，太監張永泰傳旨：同樂園圓光門內着王致誠畫美人畫一幅。欽此。〔乾隆十四年七月十五日、1749年8月27日〕

傳旨：瀛臺蘭室，着王致誠起通景畫稿一張。〔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1749年12月18日〕

傳旨：靜宜園棲雲樓、松塢雲莊殿內西進間，南牆上着王致誠、王學起通景畫稿，呈覽。欽此。〔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750年12月20日〕

傳旨：萬壽山樂安和圓光門二面，着王致誠畫美人。欽此。〔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六日、1754年5月7日〕

承恩公德奉旨：帶領西洋人王致誠往熱河畫油畫十二幅。欽此。〔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1754年9月9日〕。

傳旨：西洋人王致誠畫油畫御容一幅，熱河掛。欽此。〔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三日、1754年11月16日〕

傳旨：着王致誠畫御容射箭吊瓶一幅。欽此。〔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755年6月3日〕

傳旨：新建水法三間樓上東西牆掛屏四面，着王致誠用絹畫人物四幅。欽此。〔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760年5月10日〕

傳旨：翔鳳艇五艙左夾道北牆門上用條一張，着王致誠畫美。欽此。〔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初一日、1762年6月22日〕

傳旨：思永齋佳處領其要插屏一座，正面著金廷標畫宋人畫一幅，背面着王致誠用絹畫西洋人物畫一幅。欽此。〔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1762年7月23日〕

傳旨：怡性軒樓下西一間揭下油畫一張，着王致誠畫人物，王幼學補景用絹畫。欽此。〔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1762年12月11日〕

傳旨：瀛臺聽鴻樓北門內玻璃插屏後着王致誠畫西洋畫一幅。欽此。〔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1763年3月7日〕

二十三日，接得郎中德魁員外郎安泰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初八日起的水法十一間樓明三間殿內東西牆上掛屏四件，門窗戶斗八件，呈覽。奉旨：着西洋人王致誠等畫，欽此。〔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1764年2月24日〕

傳旨：瀛臺日知閣殿內五屏風群板，着王致誠畫宣紙異獸。欽此。〔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764年5月22日〕

傳旨：澄虛榭靜香館著王致誠、王幼學等畫支窗線法絹畫一幅，欽此。〔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七日、1764年6月6日〕

傳旨：着王致誠、艾啟蒙畫水法三間樓上插屏面，西洋人物畫。〔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二日、1769年8月3日〕

王致誠墓碑考

宮廷畫家王致誠，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逝於北京，葬在海淀區彰化村正福寺法國耶穌會公墓。墓碑現藏於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2002年10月正式對外展出。

一、墓碑變遷

正福寺是繼“滕公柵欄”之後，北京又一處較大較為集中的天主教墓地，又稱為法國傳教士墓地，位於海淀區四季青鄉，屬高莊村委會管轄。村呈帶狀，佔地190.1畝，主街東西走向，瀝青路面。現有三百二十餘戶，一千一百多人。正福寺原為明初大將徐達的後人所修的家廟，年久失修，早已廢棄，僅存地名。

正福寺法國耶穌會公墓，始建於雍正十年(1732)，到1901年，正福寺公墓已安葬六十八位外籍傳教士，其中包括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葬於此地的王致誠修士。但是，墓碑上並沒有刻“王致誠”三字，而是“耶穌會士巴公之墓”。其原因，筆者在



1900年以前的正福寺墓地寫生圖 原載 Hubrecht, *Grandeur et Suprématie*, p. 371.



巴德尼（王致誠）墓碑

王宏輝攝於2000年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本文的開頭“王致誠與巴德尼”中作了敘述。然而，我們從1921年法國《通報》第191頁的文字中得知，法國耶穌會 Zéphyrin Guillemin 主教在1869年寫給他的家鄉（他與王致誠是同鄉）研究會的一封信中提到正福寺墓地：“在 Parrenin 神父墓附近是 Fr. Attiret 的墓，墓碑已殘破，碑陽刻有拉丁文：

DIONYSIUS	IN MISSIONE
ATTIRET,	ANN.XXX
GALLUS,	OBIIT PEKINI
SOC. JESU.	DIE VIII DECEMB.
VIXIT IN SOC.	ANNO MDCCLVIII
ANNIS XXXIII	AETATIS LXVI

碑的背面刻有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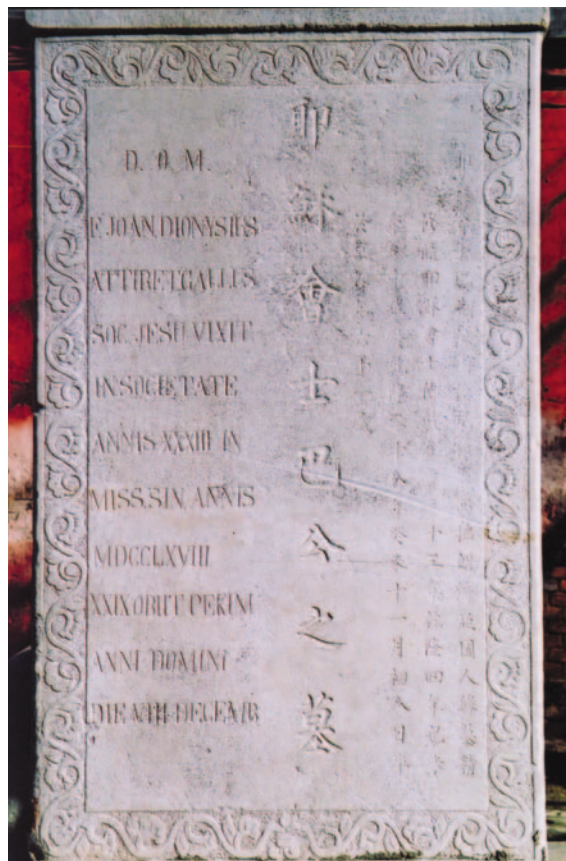
他沒有錄下中文碑文，而是將中文譯成了拉丁文介紹給他的同鄉，即：

D. O .M.

Monumentum D. Wouong tsi-ching erectum. D. Wouong Tsi-ching, Jesuita, Gallus, perfectionis amore, Patres Jesuitas, ad praedicandam fidem secutus est. Qui, cum annis 30 in aula Imperiali laborasset, 64 annos natus uita decessit.

Ipsius morle Imperatori annunciata, eodem die Imperator ex aorario publico pro eius sepultura misit 200 taülia argenti, quae quidem accepta sunt.

〔意譯：這通墓碑是王致誠的。王致誠是法國耶穌會士。耶穌會神父們認為他是非常博愛的人。他為皇帝工作了三十年，六十四歲去



巴德尼（王致誠）墓碑碑文

王宏輝攝於2000年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世。在他去世時，有人將此事報告給乾隆皇帝。皇帝從國庫中撥出二百兩銀子為他安葬。

這封信，證實了 Fr.Attiret 就是王致誠，而且原碑上刻有“這通墓碑是王致誠的”中文字樣。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的王致誠墓碑，陽面中題為“耶穌會士巴公之墓”，左側刻有拉丁文，右側刻有中文；碑陰為素面。也就是說，目前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王致誠墓碑不是原碑，而是 1900 年後重修正福寺墓地時復刻的。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耶穌會“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記錄了正福寺墓地的創建、破壞、重建、再建的年代。碑陽正書拉丁文，四周雕刻有中國傳統的卷草紋圖案。碑文為：

HOC FIDEI CHRIST MONUMENTUM
A PR_DECESSORIBUS SUI ANNO 1732 ERECTUM
P.P GALLI S.J. EX INTEGRO RESTAURARUNT ANNO 1777.
IMPIA MANU DESTRUCTUM ALUMNI CONGREG.
MISS. DENUO EXTRUXERUNT.
ANNO 1863.

〔譯文〕正福寺天主教公墓記，1732 年（雍正十年）由法國耶穌會在此建墓地，後被沒有信仰的人破壞。1777 年（乾隆四十二年）重建，1863 年（同治二年）由遣士會再次重建。

〈正福寺公教公墓記〉碑，通高 72 釐米，寬 119 釐米，厚 69 釐米；上部小座，高 39 釐米，寬 77 釐米，厚 49 釐米，質為青白石。碑頂中央處有一直徑為 20 釐米，深 15 釐米的圓槽，原是安置十字架的地方。碑陰還刻有拉丁文：

PPCALLL.SOC IESU POSUEPE AN DOM
MDCCXXXII.

〔譯文〕1732 年法國耶穌會神父建此碑於此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曾一度大建防空洞，備戰備荒。當時正福寺墓地的石碑也沒有逃脫歷史的厄運，被人們運往西城區月壇北街的西城醬菜廠，用作防空洞的蓋板，直到 1992 年才被人們偶



〈正福寺公教公墓碑記〉碑陽 王宏輝攝於 2001 年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然發現。當年，位於北京西城區月壇北街的西城醬菜廠準備遷址時，北京市教委擬在醬菜廠的舊址處建一所中學，即北京市第112中學校。施工前，112中學施工單位發現，院內防空洞中有大量傳教士墓碑，為保證施工進度，希望文物部門能盡早把石碑拉走。北京市文物局得知後，立即派石刻藝術博物館專業技術人員前去勘察，並撥出專款，由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購買了建築材料，組織人工，將墓碑替換出來，運至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這批傳教士墓碑才得以收藏、研究、展出。王致誠墓碑祇是其中之一方。

二、墓碑形制：

方首、方座。

碑首：碑額鐫刻花草、十字架及海水江崖圖案。

尺寸：碑高76釐米，寬69釐米，厚20釐米。

碑質：漢白玉。

三、墓碑錄文

漢文、拉丁文合璧。漢字正書存5行78字。

中題：耶穌會士巴公之墓

漢文：耶穌會士巴先生字德尼係泰西拂郎濟亞國人緣慕精修隨耶穌會士傳教在會三十三年乾隆四年己未來至中華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十一月初八日

卒於京都年六十一歲

拉丁文：D. O. M

F. JOAN. DIONYSIUS ATTIRET GALLUS
SOC. JESU VIXIT IN SOCIETATE ANNIS XXXIII
IN MISS. SIN. ANNIS MDCCLXVIII XXIX OBIIT
PEKINI ANNI DOMINI DIE VIII DECEMB.

〔譯文〕獻給至善至尊的天主

巴德尼修士，法國人，耶穌會士。在會三十三年，在中國傳教二十九年。主曆1768年12月8日於北京去世。

四、碑文卒年考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王致誠墓碑，拉丁碑文記載，王致誠於1768年逝世；中文記載於乾隆廿八年，即1763年逝世。二者當有一誤。

法國耶穌會 P. Planchet 神父，在1918年出版的《正福寺墓地與教堂》一書第65頁記錄的碑文記載王致誠去世於乾隆廿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享年61歲，與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王致誠墓碑中文記載一致，即逝世於17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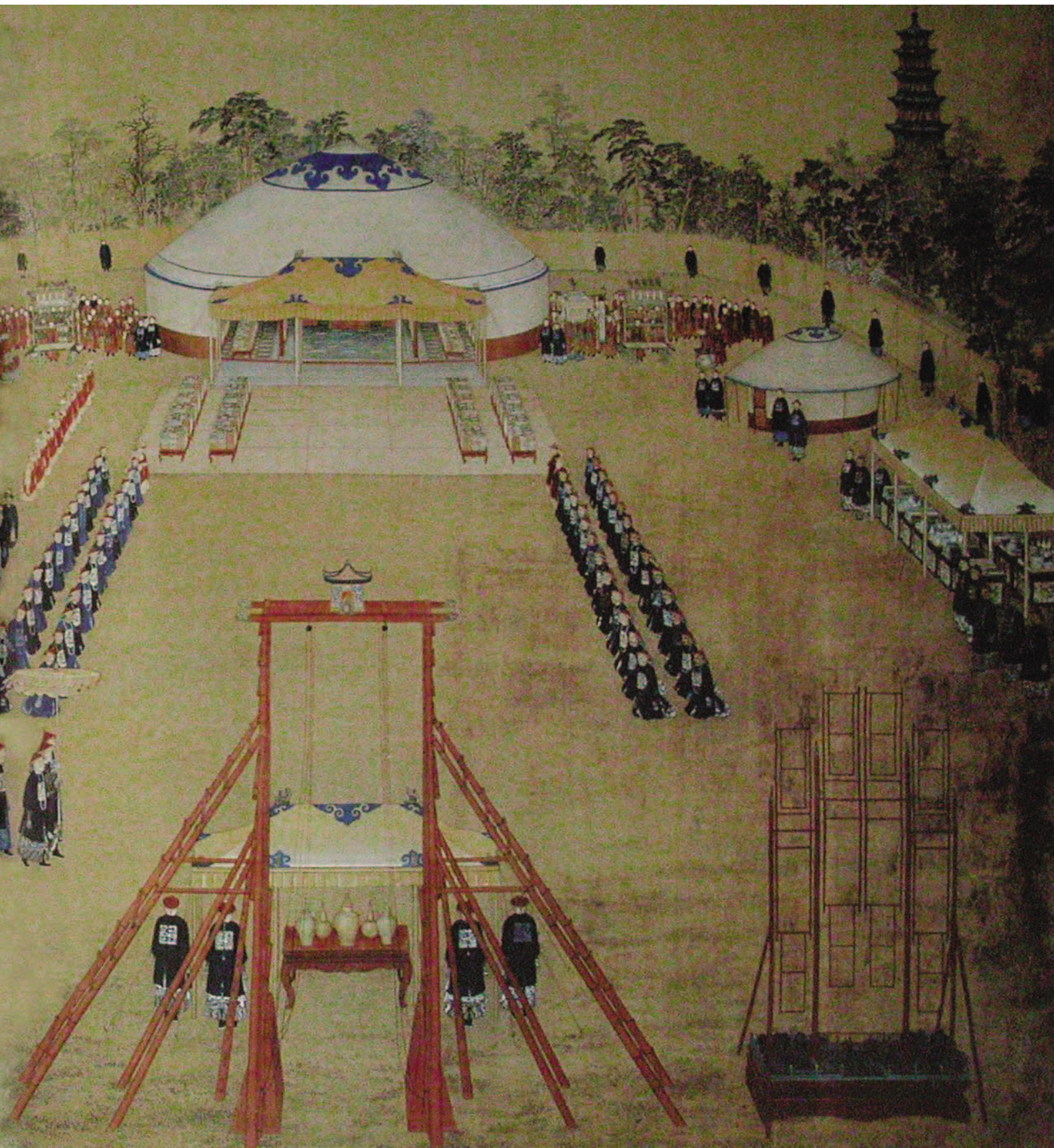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從王致誠1738年來到中國，且服務於宮廷三十年推論，王致誠逝世的年代應是1768年，而不是1763年，享年為66歲，而非61歲。



〈正福寺公教公墓碑記〉之碑陰 王宏輝攝於2001年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萬樹園賜宴圖（絹本設色 221.2 x 419cm）



近日筆者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中發現，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767年3月18日）曾命太監如意傳旨：“水法三間上插屏二面着王致誠畫人物捐畫二幅。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1768年5月14日）命太監胡世傑傳旨：“鑑園師善堂北次間北牆西邊假門上，着王致誠畫人物絹畫一幅。欽此。”從這兩份檔案中我們不難看出，畫家王致誠在1768年5月14日之前依然服務於宮中，而且仍然勤於繪畫。

在乾隆三十四年皇室檔案紀錄的聖旨中，還記錄了乾隆帝命畫家艾啟蒙接替王致誠完成大水法的人物畫稿的聖旨，即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二日（1769年8月3日），命太監胡世傑傳旨：“王致誠畫過水法三間樓上插屏背面西洋人物畫二幅，一幅畫至八成，着艾啟蒙接畫，未畫一幅不必畫。欽此。”從1769年8月3日以後的皇室檔案中，筆者再沒見到有關王致誠修士的活動記錄。

從宮廷檔案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畫家王致誠逝世於1768年5月14日之後。因此，墓碑的中文卒年是錯的。

【註】

- (1) 費賴之著《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出版。
- (2) Huc 著《基督教傳教史》，頁99-100。
- (3) (法) 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耿昇譯。
- (4) 〈三王來朝〉圖，為拜占庭風格的聖像畫。作者不詳。俄羅斯東正教聖像畫，壁畫風格。內容取材於《聖經》中《馬太福音》2:1-12。《視覺〈聖經〉——西方藝術中的基督教》一書頁68記載：耶穌降生時，有幾位博士（又稱為“王”者）從遙遠的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他們發現了一顆新的星，這顆星表示誕生了一位新的猶太國王，所以他們在這顆新星的指引下來到這裡，尋找新的猶太王，向他表示祝賀。在新星的引導下，他們在伯利恆停了下來，找到嬰兒耶穌，並俯伏下拜，獻上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然後在天使的指引下繞道回東方去了。《聖經》中沒有記載或說明到猶太來的東方博士（或王）的具體人數，後人根據他們獻上的三件禮物認定來朝者為三人，故稱“三王來朝”。
- (5) 費賴之著《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頁972。

(6) 《耶穌會士書信集》卷三，頁793。

(7) 《清宮洋畫家》頁117。

(8) 《中國美術全集》載：《十駿馬圖冊》紙本、設色、縱24.2釐米，橫29.1釐米。此圖冊畫乾隆坐騎十匹駿馬：萬吉驕、闕虎驕、獅子玉、霹靂躑、雪點鵬、自在驕、奔雪池、赤花鷹、英驤子和爾雲駛。作者採用西洋畫法，十分注意馬的解剖、結構，用工細縝密的線條表現駿馬的動態，造型準確，富有立體感和皮毛的質感。

(9) 《故宮文物大典》第一卷載：〈萬樹園賜宴圖〉軸，絹本，設色。縱：221.2釐米，橫：419釐米。其畫風細膩精致，中西合璧。在宮中除作畫外，還參與圓明園歐式建築的設計與施工，乾隆三十三年卒於北京。〈萬樹園賜宴圖〉描繪清高宗弘曆於乾隆十九年（1754）夏季在承德避暑山莊的萬樹園內，設宴招待蒙古族杜爾伯特布的首領車凌、車凌烏巴、車凌孟克的情景。乾隆皇帝端坐在由十六個內侍抬着的肩輿上，在王宮貴族、文武大臣的簇擁下，緩緩進入宴會場，“三車凌”等被接見的人跪在地上迎候。畫面的中後部是一座圓形帳篷，帳中設寶座，帳前為宴席，帳篷兩旁几案上擺滿了賞賜的器物 and 絹帛，另外還排列着誦經的喇嘛和樂隊。整個宴會場地圍以布帷，並有武裝侍衛把守。布帷外的樹林中，人們在殺雞宰羊，準備宴會的膳食。右上角有一座磚瓦結構的高塔，即避暑山莊內的永寧寺塔，畫面前的空地置表演用木架。圖中乾隆皇帝和其餘四十多人的頭像均為肖像，是畫家對着真人寫生而成，形象逼真，畫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10)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一四。

(11) 賜宴，又稱“蒙古包宴”。分為“日宴”和“夜宴”兩種，日宴和夜宴的內容相同，區別在於夜間滿園懸掛綵燈，火樹銀花五彩繽紛，白天同是此景，與夜間效果無法相比。

(12) 火戲，指乾隆年間河北承德避暑山莊萬樹園內的演出活動。“火戲”為幾百人的集體舞，演員手持各式綵燈邊舞邊唱，隨着音樂變換隊形，組出“太平萬歲”、“萬壽無疆”等字樣，接着便是燃放焰火，使演出達到高潮。

(13) “和卓”為派罕帖爾後裔之稱。和卓阿哈瑪特的兩個兒子，即長子布拉泥敦、次子霍集占，復稱為“大小和卓”。

(14) [法國] 伯德萊著《清宮洋畫家》頁76。

(15)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頁315。

(16) 莊吉發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頁528。

(17) 法國《通報》，1921年出版，頁266-267。

(18) 《中國大百科全集·美術卷》載：羅可可（Rococo），為法國17世紀藝術式樣名詞，發端於路易十四（1643-1715），流行於路易十五在位（1715-1774）時代，風格纖巧、精美、浮華，又稱“路易十五式”。其繪畫、設計特點：曲線趣味，非對稱法則，色澤柔和豔麗、崇尚自然、人物意匠上的諧謔性、飄逸性等。